

中国现代
文学馆
青年批评家丛书
第三辑

熊辉 著

中国当代新诗 批评的维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熊辉 著

中国当代新诗 批评的维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新诗批评的维度 / 熊辉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4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301-27963-2

I. ①中… II. ①熊…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2676 号

- | | |
|-------|---|
| 书 名 | 中国当代新诗批评的维度
ZHONGGUO DANGDAI XINSHI PIPING DE WEIDU |
| 著作责任者 | 熊 辉 著 |
| 责任编辑 | 黄敏劼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963-2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pkupw@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
| 印刷者 |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21 印张 268 千字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48.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丛书主编 吴义勤

丛书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倡议和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于1985年正式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建馆二十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并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为了加快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中心建设的步伐，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从2011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并希望把客座研究员制度与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结合起来。因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问题不仅是批评界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于整个青年作家队伍乃至整个文学的未来都具有方向性的问题。青年评论家成长滞后，特别是代际层面上70后、80后批评家成长的滞后，曾经引起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担忧甚至焦虑。因此，客座研究员的招聘主要面向70后、80后批评家，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学术平台为青年评论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经过自主申报、专家推荐和中国现代文学

馆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招聘了三期共 30 名青年评论家作为客座研究员。第四批客座研究员的招聘工作也已经完成。

四年多来的实践表明，客座研究员制度行之有效，令人满意。正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青年评论家在学术上、思想上的成长和进步非常迅速。借助客座研究员这个平台，通过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例会和学术会议，他们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姿态快速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关注最新的文学现象、重视同代际作家的创作，对于网络文学、类型小说、青春文学等最有活力的文学创作进行即时研究，有力地介入和参与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在对青年作家的研究及引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 70 后、80 后批评家的代表，他们的“集体亮相”，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和结构，带动了一批同代际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标志着 70 后、80 后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鉴于客座研究员工作的美好成效和巨大社会反响，李冰书记在第一批客座研究员到期离馆时曾专门作出了“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要进一步扩大规模”的批示。

为了充分展示客座研究员这一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就与风采，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决定推出“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评论家丛书”，为每一位客座研究员推出一本代表其风格与水平的评论集，我们希望这套书既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收获，又能够成为青年批评家们个人成长道路的见证。丛书第一辑 8 本、第二辑 12 本分别在 2013 年 6 月、2014 年 7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现在第三辑 11 本也即将付梓出版，我们对之同样充满期待。

是为序。

吴义勤

2016 年夏于文学馆

目 录

丛书总序 吴义勤 3

第一章 中国当代新诗批评现场 1

第一节 当代新诗批评人文精神的萎缩 2

第二节 当代新诗批评的弱化 20

第三节 当代新诗批评的阐释焦虑 28

第二章 中国当代新诗的人文精神 35

第一节 当代诗歌精神的五四传统 36

第二节 当代新诗精神的游移 80

第三节 当代新诗的人文情怀 85

第四节 当代新诗的人世与出世情怀 109

第五节 当代新诗与精神家园的建构 123

第三章 中国当代新诗的生命意识 133

第一节 当代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134

第二节 当代诗歌的生命书写 140

第三节 当代诗歌的“中年”写作 157

第四节 当代女性诗人的“中年”写作 171

第四章 中国当代新诗的艺术探求 183

第一节 传统诗歌艺术的现代传承 184

第二节 根植于传统诗歌艺术的创新 197

第三节 当前军旅抒情长诗的艺术特质 215

第五章 中国当代新诗的代际批评 233

第一节 60后诗人的还乡情结 234

第二节 70后诗歌的现代性特征 238

第三节 70后女性生存现状的书写 252

第四节 90后散文诗创作的特质 260

第六章 中国当代诗歌批评的阐释 279

第一节 译介学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拓展 280

第二节 西方美学观念的转换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 285

第三节 上园派诗学观念的合理性及其历史意义 301

第四节 新世纪五年来的新诗研究 318

后 记 328

第一章

中国当代新诗批评现场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文学经典的建构方式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里，商业化生产方式几乎左右了中国社会所有行业的运营，文学也被视为可以赢取利润的“商品”。在平面化和浅俗化的时代，人们对物质的膜拜胜过了对精神的追求，那些曾经被视为神圣的学术或牢不可破的社会规则在物质的强力冲击下早已黯然失色，以物质导向为旨归的新的价值观念悄然确立。伴随着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的涌入，曾经的“一元论”和“中心论”也朝不保夕，权威不复存在，“神圣”也被消解得平凡无奇。因此，我们不约而同地将这个时代概括为“多元化”时代，那种依靠“权力”建构批评的方式在当前的语境中已很难发挥作用。每个阶层、每种学术思潮和各种价值观念都企图构建并推行自己的批评模式，但却遭遇了共同的难题——互不认同，我们真正步入了文学批评危机的时代，但也是繁复丰盛与众声喧哗的时代。

本部分以当代诗歌批评为例，主要分析了诗歌批评人文精神的缺失、新诗批评功能的弱化与其征候，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多元化审美格局下诗歌批评的阐释焦虑，目的当然是呼吁建立起和谐的当代诗歌批评生态。

第一节

当代新诗批评人文精神的萎缩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信仰、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而且还给知识界创设了新的文化意识和话语环境。伴随着新的价值体系和时代精神的确立，新诗批评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也出现了“弱势”的边缘化走向。在“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中心地位和大众代言人身份遭遇“经济”的强势瓦解之后，新诗评论者要么怀着深重的“失落感”从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立场上后退，要么借用新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目标去化解新诗批评应负的社会责任，导致当代新诗批评人文精神的萎缩成了不争的社会事实。就其原因而论，除了与现世的社会大环境及中国的历史走向相关外，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艺工作者自身价值取向及人生追求的不断更迭紧密联系。在社会不断发展和文化产出不断增加的当下，反思中国当代新诗批评人文精神的萎缩对于重建社会人文精神，或重建诗歌评论者的社会形象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同时，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语境下，中国当代新诗批评人文精神的重建对于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建构也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当前新诗批评人文精神的萎缩主要体现为视野褊狭且没有创见、价值混乱且精神迷失、漠视政治而关心自我的生存体验，很多评论者全然无视普适性的审美观念和精神立场。此外，一些评论文章随波逐流，没有坚定的人文立场和精神信仰，在社会俗化或物质化潮流的冲击下往往选择精神逃亡或放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关注社会问题和当下人的生存现状是中国诗歌批评传统的根本要素，也是评论者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石。孟子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统治者当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那知识分子则当“克己复礼”，讲求“仁爱”，方能建构起“大同世界”。护道立场和忧民思想是中国文艺批评精神的内核，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饰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①“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实质上指的是“忧民”和“救道”思想，鲁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表明这是中国文艺工作者最应该也是最值得延续和承传的人文精神。何为“人文精神”呢？“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终极关怀，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②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是支撑整个社会发展的最为积极的因素，无论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来看，还是从人文精神的社会作用来看，不管哪个时期，知识分子都应该从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积极建

①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

② 钱念孙：《人文精神与知识分子》，《江淮论坛》1995年1期。

构人文精神，发扬“救道”和“忧民”思想，勇于担当沉重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推动人类的文明进程。诗歌评论者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一支，也应该具有相当的担当意识。

“忧国忧民”和“明道救世”是中国诗歌批评思想的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文艺工作者（古时称“士”或“士大夫”）就树立了社会道义（“礼”）的拯救者形象，诗歌批评极具忧国忧民忧君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从孔子开始，中国的诗歌批评便以“道”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和言说对象，尽管诸子百家所倡言的“道”之内涵各不相同。比如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从相反的方面表明在“无道”的年代，不仅“大夫”要言“政”言“道”，甚至连“庶人”也要“议道”。此言论便明确地道出了士人在“无道”的“礼坏乐崩”的年代应该积极地批评议论时政，承担起建立维系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文明的“道”的责任。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也正是从“建道弘毅”的立场出发，写出了像《少年中国说》这样气贯长虹的文章，他们以社会拯救者和主人翁精神号召青年在国家落后的形势下起来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可以说，“明道救世”已经成了中国新诗批评精神的一种“原型”。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很多新诗评论者“不但从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向后退，从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向后退，更从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价值的自信上大踏步地向后退了”^①。新诗评论人文精神的全面后退首先表现为自我知识体系的残缺和人文视野的褊狭。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对本土问题具有超乎想象的狂热，这与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所圈定的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有关，古代知识分子大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报效祖国，并非是为了获取知识、了

① 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

解世界和拓展视野，这使他们从一开始就缺乏关注自然界的科学眼光，也缺乏放眼“海外”的大气，从而在“闭关锁国”的封闭性生存状态中热衷于本国政治和道德的建构，热衷于自我仕途的发展和个人生存利益的维护。这种“本土关注”的狭窄眼光导致中国诗歌批评对政治充满迷狂和强烈的参与欲望，关心政治的偏执性心态往往使他们不在自我知识体系的完备上着力，也没有对知识本身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在无形中阻碍了文学评论对政治以外的其他知识的了解，其观照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视野也就相应地狭窄起来，“能够以开放的胸襟，平等地学习和对待世界不同地域的文化，则始终是士大夫阶层难以自我消弭的一个误区”。直到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 21 世纪，中国文学评论的这一缺点仍然没有消除：“大陆知识分子对自身的生存境遇实在谈得太多，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却往往知之甚少；尤其缺少一种宏观的体悟把握。”^①当前，伴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文化的相互交融和补足已经成为文化界的一个新课题，而又有多少新诗评论者在心理和行动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呢？他们要么盲目地照搬外国文化以强力地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要么固执地抱守着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无视他国文化的长处，从而使自己陷入创作的无序和紊乱之中，陷入文论“失语”和失养的迷途。说到底，这其实是当前文学批评界世界性眼光的缺乏，他们没有一种宏观的文化视野，这是传统的文艺批评思维导致的文艺批评人文精神的萎缩，从而将中国当前的新诗批评引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沼之中。

中国当代新诗评论视野的褊狭除了表现为缺少世界性眼光外，在今天尤其表现为观照对象的“精英化”和“自我化”，新诗批评不再以满足普适性的文化需求作为书写目标和价值基点。作为人类精神文明

① 李美锋：《生存境遇与文化视角——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话语习惯偏区》，《中国财经报》1996 年 3 月 29 日。

创造和传播的重要方式，新诗创作和批评的潜在读者和表现对象如果将大众排除在外，不仅与传统士思想的“忧民”相悖，而且与评论者自身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相悖，这种势态最终会导致新诗评论者在诗歌内部的自娱自乐，导致大众与诗歌的分离和对峙，削弱新诗批评的人文关怀。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写实小说在平面化地表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时，忽略了形而上的精神提升；而诗歌创作上的知识分子写作在表现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文化立场时，却又忽略了人文精神的传播，对于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建构而言，这两种创作潮流都不足以效法。以时下受人们推崇的诗人来说，韩东和伊沙等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客观身份不仅标志着他们创作的知识分子立场和作品的知识分子气息，而且他们创作的一些盛行诗歌还将大众关怀置入盲点，直接以知识分子作为书写和接受的中心。比如韩东的《大雁塔》和伊沙的《车过黄河》等，虽然在书写方式上多采用简单的口语表达，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是对权威和中心的解构，其写作旨趣仍然具有浓厚的精英气息。这种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运用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来从事知识分子自我精神写作的态势，“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表明“知识分子从对全社会的关注转化为对自身的关注，知识分子从对全社会的担当退守为对自身的担当”^①。当然，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作为诗歌的表现对象本来无可厚非，在一个诗歌创作多元化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写作”本就是一个合理的存在现象，至少它能够深刻地表现当前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存在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知识分子作为全社会精神文明的主要创作者和传播者，作为引导大众的文化消费和文化取向的精英阶层，其创作的目的就不能仅仅囿于自我精神的表达和愉悦，他必须具有担当意识，其文学观照视野必须开阔到以主流社会和大众社会的需求为限。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当年

① 邵建：《知识分子写作：世纪末的“新状态”》，《钟山》1995年2期。

盛极一时的“知青文学”也反映出了知识分子视野的褊狭。几乎所有的知青文学表现的都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痛苦遭遇和情感经历，殊不知一代又一代居住在乡村的农民的苦难和艰辛远比他们短短几年的“乡村体验”所认识到的痛苦深重很多。但几乎没有一个知青作家结合自己上山下乡的亲历来反映广大农村农民生活的艰辛，这其实也反映出了青年知识分子对苦难担当的欠缺，他们没有从宽泛的情感体验出发去体谅人民大众的生活疾苦，而只是一味地沉溺于自我生活历程的反映和抱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新诗批评就应该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客观地指出部分诗歌作品对大众文化需求和情感体验的漠视，让诗人的创作具有更多的大众关怀，从而体现出当代新诗批评在价值观念上的参考价值。

当前中国新诗批评人文精神的萎缩还表现为缺乏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混乱，这与中国新诗评论者的依附性人格相关。在中国历史上，文人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在现实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依附的地位，经济上的不独立带来了生存上的依附性。依附性的人格使他们难以保全自我思想和精神的独立，从而使文艺工作者在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上表现为一种随波逐流的软弱性。“知识分子生存上不能独立，必然依附于人，不是依附于权贵，就是依附于大款，这样，他们行为上既难以特立独行，思想上精神上也难以完全独立，因而很容易成为一种依附性的‘畸人’”。^①人格的依附性使新诗评论者很难对自我的精神信仰和批评初衷保持一以贯之的勇气，如果外部环境给他们的生存境遇带来了阻碍，他们就会放弃自己先前坚守的精神信仰，选择“精神逃亡”来求得对社会责任和艰辛生活的解脱。殊不知他们在求得自我保全的时候却放逐了自我人格和应该具备的人文精神素养，

① 邢小利：《当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与精神状况——读长篇小说〈泡浪之水〉》，《文艺争鸣》2002年3期。

有人说这是中国文艺工作者人格的“头号污点”，认为“他们从来就匮乏一以贯之，不受时尚流风左右的精神信仰。他们的价值理念完全依附在现世人生的低浅层面上，始终趋从和受制于现世人生景况的演变和更迭。他们无法为自身的存在确立一个终极性的超越维度”^①。正是这种不稳定的人格，使很多批评家抛弃了“从道者”的光辉形象，成了“唯利是图”的钻营者和真正的“从势者”。当前，部分新诗批评者的政治热情消退，这除了目前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原因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意识到可以从政治以外的其他途径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且在一个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相对削弱而经济意识又相对上升的语境中，新诗批评就会放弃对主流意识的诠释，放弃社会人文精神的建构，加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潮流之中，以赢取经济利润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方式。比如各种以商业为目的的诗歌活动，各种标以“明码实价”的吹嘘评论等便是这种价值转向后的极端体现。中国文人的传统人格（依附性人格）和处世方略（随波逐流）决定了新诗批评者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里，在一个以追求物质利益为旨趣的价值体系中必然以放逐人文精神的建构为代价去换取物质利益的实现，这本身就是人文精神萎缩的表现。价值观念的不断更迭不仅说明了当前诗歌批评人文精神的萎缩，而且是对评论者身份和立场的否定，因为真正的“从道者”会超越现世的物质诱导而坚守精神家园，成为人文精神的缔造者，恰如鲁迅所说：“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②

此外，新诗批评人文精神的萎缩还表现为作品中充斥着怀疑眼光和解构欲望。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中国人文精神传统的主导是忧民思想和护道意识，传统的士阶层总以为他们自己是真理、正义和社

① 贺奕：《群体性精神逃亡：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文艺争鸣》1995年3期。

②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会理想的代言人、执行者和创造者，“拥有所有人的价值，反对不公道的君主或其大臣，奋力呐喊，甚至死后也要使其声音在坟墓上回响”^①。可以说，文人成了社会人文精神乃至整个文化精神的缔造者和维护者，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开创的新知识分子人文传统的核心内容。然而，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很多评论者以为这股思潮代表着文化精神的高级形态，认为它必将成为主导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于是，怀着拥抱平等和自由的思想，诗歌评论界掀起了一股解构思潮，迅速蔓延着中心与主体的分离，深度模式的解构，传统文化与历史意识的失落以及平面性的大众文化的勃兴等“前卫”意识。正如有人所说：“进入90年代，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开始涌现，他们既不相信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也根本怀疑重建中国文化精神的可能，嘲弄一切绝对、普遍的真理。”^②怀疑眼光和解构欲望对于知识和观念的更新大有裨益，但如果没有厚重的文化根基和重建新文化精神的理想，对固有文化传统进行怀疑和解构便是一种破坏。一味地怀疑并解构权威和传统，其结果势必造成诗歌创作者和评论者信仰的紊乱和人文精神的迷失。试想，如果传统的文化精神被无情地消解了，那我们的灵魂又何处安身呢？“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他不但要活得舒适，更想活得心安，在手脚并用去满足物质欲望的同时，他还要寻找一种精神性的价值，在那上面安妥自己的灵魂。这就是通常所讲的信仰，或者换个学术气的词，叫作‘认同’。”^③如果我们安妥灵魂的精神之所在被消解的同时又没有确立新的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那人文精神的确立和建构便成了难以

① 福柯：《福柯专访录》，《东西方文化评论》（第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2页。

② 祁述裕：《逃遁与入市：当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命运》，《文艺争鸣》1995年4期。

③ 王晓明：《太阳消失之后——谈当前中国文化人的认同困境》，《文汇报》1995年8月27日。